

● 世界历史

20 世纪 90 年代初中美关系跌至低谷原因探析*

陈 本 红

(湘潭师范学院 社会文化系, 湖南 湘潭 411201)

[作者简介] 陈本红(1965-), 男, 湖南益阳人, 湘潭师范学院社会文化系副主任, 副教授, 主要从事世界现当代史、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

[摘 要] 中美关系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跌至中美建交以来的最低点, 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国际格局的急剧变化使中美之间共同的利益基础消失; 冷战思维的惯性导致“中国威胁论”和遏制中国论的出笼; 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严峻对立; 美国内新保守主义的得势及国会强大的反华势力等。

[关键词] 国际关系; 中美关系; 后冷战; 原因

[中图分类号] K 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3)02-0221-05

在整个冷战时期, 中美关系主要置于美国的全球战略和对苏战略之下。这个时期的中国对于美国来说, 或是冷战的敌手, 或作为友好的“准盟国”, 两者必具其一。自新中国成立至 20 世纪 70 年代初中美关系缓和前的 20 多年时间里, 美国一直把中国视为冷战的主要对手, 在一段时期内甚至将中国视做比苏联更具威胁的敌人。进入 70 年代, 美国面对苏联的威胁, 与同苏联交恶的中国维持一种“低水平的战略关系”^[1](第 10 页), 中美外交关系也终于在尼克松访华 7 年之后于 1979 年 1 月正式建立起来, 当然双方的关系是十分“脆弱的”^[2](P. 10), 而且“促使美国与中国相互靠拢并将两国联系在一起的力量是恐惧”^[3](第 109 页)。但 1989 年 6 月 5 日和 20 日, 美国布什政府宣布对华制裁五措施, 中美关系形势逆转。此后, 在布什及克林顿的第一任期内, 美国逐渐奉行一种对华挤压、遏制的强硬政策。从 1992 年布什政府允许对台出售 F-16 战斗机, 到 1993 年克林顿政府反对北京申办 2000 年奥运会; 从制造“银河号”事件, 到取消《与台湾关系法》中的美对台出售武器限制条款; 从 1994 年初美国国务卿访华, 压迫中国在人权问题上让步, 满足美方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时附加的人权条件, 到 9 月份克林顿总统公然宣称《与台湾关系法》优先于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全面提升美台实质关系; 从 1995 年美国允许台总统李登辉以私人身份访美到 1996 年中方在台海举行三军联合演习, 美派尼米兹号和独立号两个航母战斗群到台湾附近游弋示威恐吓。短短几年间, 中美两国在人权、最惠国待遇、台湾、西藏等问题上产生了强烈摩擦, 双方关系不断恶化, 走到了几乎完全对立的边缘。几乎所有的政治家、思想家和舆论界都在思索、分析、评论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可谓跌宕起伏、一波三折的中美关系。但很少有人探索 90 年代初两国关系跌至低谷的原因, 即便有人涉及, 也仅蜻蜓点水。本文不揣鄙陋, 试图对此稍作探析, 尚祈前辈同仁教正。窃以为, 在中美关系恶化之前, 就已经隐藏了种种可能影响两国关系稳定的因素, 如中美战略安全利益、冷战思维、意识形态对立、贸易摩擦、美国内政党斗争等。这些因素在遇到适当的偶然事件时便导致中美关系逆转。

一、冷战后国际战略格局的急剧变化

冷战时期,中美关系建立在美苏和东西方对抗的战略态势和战略格局上。冷战初期的 10 多年,由于反对中国的共产主义防止所谓“红色中国的扩张”和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战争和侵略政策,分别占据了美对华和中美政策的主导地位,从而导致两国对立、隔绝近 20 年。60 年代末以后,世界战略格局发生了变化。一方面,美国实力地位相对下降,又深陷越南战争泥潭,而苏联通过与美国的大规模军备竞赛,同美国争夺世界,攻势咄咄逼人,使美国霸权地位和全球利益受到威胁;另一方面,苏中两个社会主义大国由昔日盟友变为仇敌。出于解除苏联对各自国家安全、战略利益的威胁的考虑,中美两个意识形态完全对立的国家逐渐达成共识,实现了关系正常化,成为了战略上的“准盟友”。自那以后,联华抗苏一直被美视为中美关系中最优先的课题。虽然当时中美之间在意识形态、民主、人权、台湾、贸易等诸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分歧和矛盾,但双方对于主要威胁的共识和对付主要威胁的共同利益,形成了中美关系合作的战略基础。然而,80 年代中期国际形势的发展,使中美“准盟友”关系的必要性大为减弱:美苏之间由于“中导条约”的签订关系逐步缓和;中苏之间也加强了联系并于 1989 年实现了关系正常化。随着冷战的结束,特别是苏联和华约的解体,美苏和东西方对抗的国际战略格局和战略态势不复存在。中美之间对国际战略态势的共识和对付共同威胁的战略利益也随之消失,双方继续进行战略合作便失去了基础。在美国看来,既然继承了苏联遗产的俄罗斯等独联体国家倒向了西方阵营,冷战也已结束,那么中国对美国的重要性也就随之下降了。在美对华政策中,也就无需为了战略安全方面的考虑而在其他本已有分歧和矛盾的问题上作出更多的让步和妥协了。

另外,冷战结束,美国成为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它以“老子天下第一”的霸气,踌躇满志地抛出了“世界新秩序”的构想,其全球战略目标直指“世界领袖”的宝座,而中国作为一个对世界有重大影响的发展中大国,极力提倡世界多极化,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反对任何形式的世界霸权和地区霸权,无疑是美国实现其全球战略的最大障碍,必欲改造之而后快,这也加剧了中美之间的对抗。

二、冷战思维的惯性

冷战思维是指战后持续 40 多年的东西方冷战的国际大环境中人们观察国际事务的特有的思想模式或认识框架。它包括三个方面的主要内容:即过分强调国家间意识形态或价值观念的对立;“非友即敌”和必须确定一个头号敌手的观念;把苏联当做评判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行为的参照物^[4](第 61 页)。后冷战时期,冷战的遗产——冷战思维,不仅没有走进历史的博物馆,而且备受某些势力青睐,很有市场。在对待中美关系上,美国便有相当一部分人得出这样一种逻辑:冷战后,中国作为仅有的共产党大国已成为西方特别是美国意识形态上的主要对手——中国在经济领域显示出巨大的潜力,21 世纪将成为美国强劲的经济“潜在敌人”;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的军事力量也将更加强大,一个强大的中国必将对美国在世界和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提出严峻挑战。总之,“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身份崛起将会威胁到美国和国际体系中其他国家的根本性国家利益,并且在未来中国将给美国造成最大的问题”^[5](P. 10),一时间“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美国进而提出遏制中国的主张。具体政策主要包括:加强与亚太地区战略伙伴之间的关系,以此为依托巩固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存在,努力填补世界战略格局变化过程中我国周边地区的政治真空,建立针对中国的隐形的遏制圈;进一步贯彻其民主扩展战略,促使中国内部的演变;利用美国所拥有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诸方面的优势,通过在人权、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台湾、军售、核不扩散及亚太安全等问题上的施压,遏制中国的发展、影响中国的发展方向等等。显而易见,凡此遏制、高压措施,自然遭致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反对,中美关系也就逐渐下滑。

三、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严重对立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200多年来把各大洲不同种族和宗教文化背景的人们凝成一个民族的共同思想和精神支柱,那就是个人主义、私有财富和自由民主,这与强调家庭观念、社会关系和集体思想的中国传统文化格格不入。这种文化差别造成了两国在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等方面的差异。在美国人的传统思想中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感,他们认为,美国的政治制度完美无缺,血统高贵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具有向全世界推行其制度、价值观念和传播基督文明拯救落后民族的天定使命。美国历史学家迈克尔·索特曾经指出,美国式的民族主义具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强烈的千年盛世情绪,“这一情绪铸就了这个国家,使它向全人类承担责任,担当起救世主的角色”^[6](P.191)。这种使命感使得美国的外交政策富有“侵略性”,亦即在处理与自己政体不同的国家关系时,要求他国接受美国式的民主制度成为主要内容之一。20世纪50—60年代,由于两大阵营严重对立,中美对抗充满了意识形态色彩,但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中美两国在处理双边关系的过程中,一直本着求真务实的精神,有意地淡化意识形态因素的作用。正如邓小平所说的,双方都“以自己国家的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而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7](第330页)。但80年代兴起的世界性的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浪潮和前苏联解体相对和平的方式,更激起了美国对其意识形态力量的迷信。“美国的经验因而鼓舞美国人去相信,美国在各国中是惟一无可撼动的强国,并且只凭道德和善行就能无往不利。”^[8](第774页)乔舒亚·穆拉夫契克在1991年写道:“美国几乎没有费劲就赢得了冷战,……不过,美国获胜不是靠军事力量和外交技巧,而是靠基于制度之上的民主思想的力量和共产主义思想的失败。”美国决策者认为,美国文化具有无坚不摧的力量,是将专制、独裁、集权和将社会主义国家引导或演变到“西方民主大家庭”的有力武器。冷战后的美国外交政策,明显带有一种高举美国价值观大旗去“跨海平魔”的冲动。在对外战略中意识形态因素明显上升,进攻性也明显加强。而中国作为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世界社会主义遭受严重挫折的形势下仍坚持通过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的最大的国家,自然而然就成为美国冷战后在意识形态方面最重要和最强大的敌人。1989年后,美国认为是输出美式民主、和平演变中国的千载难逢的时机,也视中国为西方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重要攻击目标。美国对华政策中的一度淡化的意识形态色彩急剧升温,布什、克林顿政府在国内党派斗争的压力下,不仅以“内外结合”的人权战略压迫中国进行美国所希望的“政治改革”,而且已发展到对华几乎言必称“人权”的地步。中美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方面的根本分歧和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中对意识形态分歧的重视是90年代初中美关系陷入困境的重要因素。

四、新保守主义思潮的崛起和国会强大的反华实力

新保守主义的外交思想建立在“反共”基础上。美国历史学家霍罗威茨认为:“新保守主义的全部带有偏见的努力,实际上是认为同共产主义暴政进行战争不可避免。”在冷战期间,它把以苏联为代表的共产主义视做对美国自由民主的最大威胁,把同苏联的对抗和斗争当做美国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它的外交理论主要包括:1. 世界和平与秩序的稳定离不开美国的领导,美国理所当然地应担负起这一历史使命。新保守主义认为美国的社会制度和民主模式是无与伦比的,最优秀的东西自然在全球范围内加以推广;2. 美国和美国领导下的世界秩序仍然面临着严重威胁,这些威胁主要来自对美国怀有强烈敌意的所谓无赖国家和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大国;3. 要维护和强化美国的领导地位,最重要的不是运用力量而是使用这种力量的意识,意即为捍卫原则和履行诺言而不惜代价。在美国,保守势力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相当一批极端保守派是政界官员、议员、教授、记者。如里根政府顾问迪弗、参议员戈特华特、

赫尔姆斯、前白宫顾问艾伦、驻台“大使”昂格尔、共和党参议员布朗、穆尔科斯基和民主党参议员西蒙等。保守派思想库也有如乔治城大学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胡佛研究所等。美全国有 70 多个保守组织和 80 多家报刊,形成保守网络,相互呼应,并与台湾帮结合,得到一些垄断财团的支持。80 年代,以共和党为代表的保守主义势力在三次总统大选中获胜,新保守主义思想逐渐获得主流地位。特别是 1994 年美国中期选举中,保守党重新夺回失掉近 40 年之久的国会参众两院多数党地位,“共和党的政策主张越来越多地变成了政府政策”。而且,冷战的和平结束并未使美国对外政策中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淡化,“反共”这一重要冷战遗产被完整地继承下来,这也为新保守主义思想发挥影响提供了广泛的空间。新保守主义的外交思想及其在国会中和国家政策中的作用的增强给本已倒退的美中关系无疑是雪上加霜。1995 年,保守党控制的国会,对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频频发难,不断通过反华议案尤其在台湾问题上连续掀起反华鼓噪,1995 年 5 月美众参两院分别以 396 : 0 和 97 : 0 票通过允许李登辉访美决议,结果导致中美关系在 1995 年 5 月、1996 年 3 月处于危机四伏之中,而险些破裂。

不仅如此,美国国会强大的反华实力频频施压也加剧了中美关系的动荡和倒退。90 年代以来,美政府与国会之争十分激烈。与布什政府相比,大部分国会议员的对华立场具有更加强烈的反共色彩,也更加霸道。北京风波以来,美国国会除支持布什政府的各项对华制裁措施外,还通过了一系列反华决议和法案,包括中断美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和贸易发展计划在华项目;停发对华卫星出口许可证;延长中国留学生在美滞留期;反对巴统放宽对华技术转让;组建特别委员会审议对华广播计划;宣布西藏是“被占国家”;鼓励香港“民主化”;支持台湾在国际经济组织中“发挥更大作用”,等等。

诸多民主党议员攻击布什的对华政策,含有强烈的党派动机。布什执政后正遇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又打赢了海湾一战,在外交上得分甚多,惟其对华“建设性接触”政策,成为民主党人大肆攻击的靶子。1992 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林顿及其支持者为争取选民,猛烈批评布什的对华政策是“一次一次地与专制者,而不是要推翻他们的人站在一起”,声称“美国将不再姑息从巴格达到北京的暴君们”,呼吁“为中国大陆的人权而努力,把布什打败”。个别议员为拉选票,出风头,以污蔑攻击中国为政治时髦。加州民主党女议员、“国会中国工作团”主席洛佩西竟利用 1991 年夏访华之机到天安门广场演出“声援六·四民运”闹剧。1990 年以来,众院连续 3 年以压倒多数通过中止我最惠国待遇和为延长我最惠国待遇施加附加条件的决议。尽管布什政府每次都予以否决,但其对布什对华政策的影响却不容低估。1992 年布什售台战机的决定,便与国会压力紧密相关。据报道,此前曾有 200 余名议员联名致信给布什,以拯救美军火工业和工人就业为由,强烈要求售机。美国国会影响并制约美对华政策,还借助于诸多反华利益集团和新闻媒体。这些利益集团包括“亚洲观察”等人权组织、劳联——产联、美国纺织业协会等贸易保护组织,及“中国留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等所谓“中国持不同政见者”组织,其代表成为参、众两院各类有关中国问题的听证会的座上客,造谣惑众,影响甚大。美国新闻界,特别是《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和《洛杉矶时报》等自由派大报则为国会反华势力推波助澜。其 1989 年以来的对华报道,多有歪曲;其发表的有关社论和评述,则几乎无不反共反华。此种舆论,极大地影响美国公众的对华态度,并通过选举政治体制,增强反华议员的势力,使美对华政策更趋强硬。

90 年代初以来,共和党政府、民主党国会和民主党政府、共和党国会,府会相互制约,争夺对华政策的主导权,也是中美关系动荡的一个重要原因。在美国,虽然对外政策制订的大权在政府手中,但国会可以凭藉就对外政策提出议案、通过决议和举行听证会等多种渠道制约政府的对外政策。90 年代以来,美国会不断通过反华决议、举行反华政策听证会和对政府对华政策实施情况进行调查等多种方式制约美国对华关系的改善,为两国关系的发展设置障碍。

总之,由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冷战结束,中美之间压倒一切的共同战略利益基础消失,国际格局急剧变化;国际安全因素下降;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因素骤然上升,以及美国内反华先锋——新保守势力的强大,加上在上述国际大气候下,中国国内 1989 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给美国以借口,使中美关系在 1996 年初倒退到建交以来的最低点。

[参 考 文 献]

- [1] 倪孝铨, 罗伯特·罗斯. 美中苏三角关系[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 [2] HARDING Harry, A Fragile Relationship: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since 1972[washington D.C[M].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92.
- [3] [美] 理查德·M·尼克松. 超越和平[M]. 范建民, 等译.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5.
- [4] 刘小明. 何谓“冷战思维”[J]. 世界经济与政治, 1997, (4).
- [5] IIEBERTHAL Kenneth. A New China Strategy[M]. Foreign Affairs, 1995, (6).
- [6] HUNT Michael H. Ideology and U S Foreign Policy[M].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7.
- [7]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 [8] [美] 亨利·基辛格: 大外交[M]. 海口: 海南出版社, 1997.

(责任编辑 吴友法 涂文迁)

Freeing Sino-US Relations in 1990s: Reasons

CHEN Ben-hong

(Department of The Society & Culture, Xiangtan Normal University, Xiangtan 411201, Hunan, China)

Biography: CHEN Ben-hong (1965-), male,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The Society & Culture, Xiangtan Normal University, majoring in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contemporary history.

Abstract: Sino-US relations down to the lowest point in the early years of 1990s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Sino-US diplomatic relations, the reasons lie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the rapid chang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 pattern dissolve the Sino-US basic common interests; Mentality cold war's inertia leads to the merging of the theory of menace of China and the theory of containing China; Sharp contrasts of social system, ideology and different senses of value; Neo-conservative in power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nti-China force in the congress is strong.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ino-US relations; post cold war; reason